



# 茅盾

## 回忆录 (下)

The memories of Mao Dun      茅盾 韦韬○著

 華文出版社  
SINO-CULTURE PRESS

# 茅盾回忆录 (下)

The memories of Mao Dun 茅盾 韦韬○著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
| 战斗的一九四一年 / 1     |
| 桂林春秋 / 30        |
| 雾重庆的生活 / 60      |
| 走在民主运动的行列中 / 87  |
| 抗战胜利后的奔波 / 119   |
| 访问苏联·迎接新中国 / 155 |
| 风暴前夕 / 191       |
| 红卫兵抄家 / 199      |
| 大串联 / 205        |
| 沉默也是抗议 / 212     |
| 含饴弄孙 / 220       |
| 痛失患难与共的老伴 / 229  |
| 消沉中思念亲人 / 239    |
| 与旧体诗词的“姻缘” / 250 |
| 圆梦 / 262         |
| 锻炼·中秋节·游公园 / 278 |
| “批林批孔” / 287     |

搬家 / 294

谣言四起的一年 / 307

丙辰清明 / 319

“大地震” / 336

“拨乱反正” / 347

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 / 358

写回忆录（上） / 369

写回忆录（下） / 381

“杂家”的负荷 / 390

最后的日子 / 403

后 记 / 423

## 战斗的一九四一年<sup>\*</sup>

抗战八年中，我曾二度客居香港，一次在一九三八年，共十个月，另一次就是一九四一年，住了九个月。两次来港，都负有任务，三八年为了创办《文艺阵地》，四一年是要和其他同志一起开辟“第二战线”。但两次的心情迥然不同。一九四一年来到香港，正值皖南事变和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，使我有一种巨大的紧迫感——必须全力以赴地工作。因此，一九四一年对我来说是战斗的一年。

香港经过三年战火的熏染，已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政治空气浓厚了，持久抗战的道理，在先进工人和知识界中已成常识，一般市民对于国家大事也不再漠不关心。港英当局，自从邱吉尔上台组成战时内阁，并对轴心国的远东伙伴日本的态度日益强硬以来，他们对于抗日宣传已不再阻拦。进步文艺界很活跃。文协香港分会早已成立，主其事者是老朋友许地山、戴望舒、萧红、端木蕻良、林焕平等。他们创办了《文协周刊》，建立了文艺通讯员站，指导爱好文艺的青年，此外，不定期地举行各种文艺座谈会。……与三八年相比，香港是大大不同了，那时还是一片“文化荒漠”，现在已出现了片片绿洲；那时是不准谈抗日，现在已能自由宣传。不过，也有不利的一面——国民党的势力挤进来了。重庆方面终于发现香港是一块重要的阵地，且已被共产党“捷足先登”。他们向香港派出了干员，建立了各种社团，到处活动；五月份收买了香港最有影响的进步报纸《星岛日报》；以盟邦身份要求港英当局取缔一切违背国府抗建国策和损害

---

<sup>\*</sup> 本章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五年八月《新文学史料》第三期（总第二十八期），原题为《战斗的一九四一年——回忆录〔二十八〕》。后编入《我走过的道路（下）》时删去副题。

国府声誉的言论。这后一条，香港政府居然同意，并且配合得十分卖力。我二进香港之后，首先发现的，就是报纸杂志（当然是进步报刊）上的天窗比三八年开得更多更大了。我研究了这些天窗，看得出香港政府那些检察官的水平确实有了提高，甚至使人怀疑他们之中有重庆推荐来的。

初到香港，没有房子，只好暂住旅馆。第二天，得到消息的朋友纷纷来看望我。许地山已多年不见，他在香港大学教书，同时主持香港文协工作。萧红与端木蕻良同来，他们早在四〇年初就来到香港，端木编文艺刊物，萧红患肺结核，正在休养。夏衍和范长江也来看我。夏衍在皖南事变之后即奉命来港，范长江稍后一些，恩来同志给他们的任务是办一份报纸。现在已筹备就绪，题名《华商报》，是对开一大张的晚报，由何香凝的亲戚、香港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和他的弟弟邓文钊（廖承志的表妹夫，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）出面向香港政府登记的，预定四月八日创刊。今天他们是来向我约稿的，在介绍了《华商报》筹备的情形之后，夏衍就开口要我提供一个长篇连载，他说，《华商报》有个综合性的文艺副刊《灯塔》，每周出五期，现在还缺一个长篇连载。我大笑道：莫非你们以为我筐中有一部长篇小说打着埋伏？夏衍也笑道：我们听说沈先生在南温泉时，天天伏案疾书，想来总有可以发表的东西。我承认道：是写了一点，但不是小说，是杂感式的散文，记录这两年在内地的见闻，而且没有写完，只写了一两万字。夏衍道：这就足够了，没有写完不要紧，可以先登起来，你一边继续往下写。我想，这次来香港的主要任务就是办报纸办刊物，支持《华商报》是分内的事，就说，好罢，你后天派人来取稿，我要从头至尾看一遍，再写一个前言。范长江心满意足地说道：现在我们有二个连载了，在沈先生之前，邹先生也答应给我们一个连载，题目叫《抗战以来》。《华商报》有了你们两位的鼎力支撑，一定开张大吉，声势夺人！我问：韬奋到香港多久了？长江答：比你早到半个月，住在九龙，正在筹备一个刊物。

我给我的“见闻录”起了一个总题，叫《如是我见我闻》，又写了一

则《弁言》，作为头一篇。《弁言》一开头就说：“这不是什么游记。游记之类，现在也颇难着笔，而且——也不便多写。”因为游记之类“难免要描写点儿风景，难免要叙述点儿‘自某处至某处，若干公里’，或者甚至于记到‘路平’或‘道险’——那不是太国防那个么？因此，我不打算写游记。”那么到底是什么呢？“说来很简单，就是七零八落的杂记。也许描几笔花草鸟兽，也许画个把人脸，也许讲点不登大雅之堂的‘人事’，讲点人们如何‘穿’，如何‘吃’，又如何发昏做梦，或者，如何傻头傻脑卖力气——总之，好比是制片厂剪下扔掉的废片，毫无连贯……只有太天真的孩子才会当一件事去赏鉴猜详。因此，作者的我，未便在此自吹这些七零八落的记述，是什么‘观察’，或什么‘印象’，老实一句话，只是所见所闻的流水账；不过我自信，闻时既未重听，见时亦没有戴眼镜，形诸笔墨，意在存真。故曰‘如是我见我闻’。”不过，《如是我见我闻》在《灯塔》上发表时，编者仍写了一段介绍文字，替我吹嘘了一通。介绍说：“名作家茅盾先生，年来漫游大西北及新疆，长征万里，深入民间。……《如是我见我闻》长篇笔记，以其年来随时精密而正确的观察，用充满着爱与力的能笔，作深刻而隽永的叙述。尤其注意的是抗战中旧的势力和新



茅盾的部分杂文。

的运动的斗争与消长，暴露着黑暗社会孕育着危机与没落，指示出新中华民族的生长与出路。”

我把《弁言》和《兰州杂碎》《白杨礼赞》第五篇交给夏衍，又接着写了离开延安到重庆一路的“见闻”，即《“战时景气”的宠儿——宝鸡》《“拉拉车”》《秦岭之夜》《某镇》《“天府之国”的意义》《成都——“民族形式”的大都会》等六篇；后来又写了离开重庆到桂林旅途中的“见闻”，即《最漂亮的生意》《司机生活的片段》《“如何优待征属”》《贵阳巡礼》《旅店小景》等五篇。这些文章长短不一，长的如《西京插曲》《“雾重庆”拾零》约五千字左右，短的如《白杨礼赞》仅一千多字。《如是我见我闻》在《灯塔》上从第一期连载到二十九期，每期登一篇或半篇。原来还要继续写下去，譬如昆明见闻，新疆见闻，延安见闻等等，可是，五月中旬突然来了紧急任务，只得中断连载，并向夏衍表示歉意。夏衍希望我以后能再提供个长篇连载，我答应了，并向他保证一定经常为《灯塔》写杂文。

紧急任务，就是为邹韬奋主编的《大众生活》写长篇连载《腐蚀》。韬奋到达香港后，即着手筹办刊物。我们的报纸已经办起来了，但还需要有我们的刊物——政论性的和文艺性的刊物——来互相配合和支援。我第一次见到韬奋，他就和我谈这件事，他打算办一个《生活》周刊那样的刊物，亲自主编，还建议我来主编一个文艺刊物。

然而筹办刊物的工作并不顺利。因为凡在香港办报刊，必须有一位“港绅”做发行人，香港政府才允许登记，而这位愿意合作的“港绅”一时却不易找到。韬奋在政治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书呆子，更不善交际。幸而徐伯昕于四月中旬来到香港，很快经第三人介绍，结识了曹克安先生。曹先生的父亲是位“港绅”，曹本人还有点头脑，自己想办一个刊物，并且已在香港政府登记注册在案，刊名《大众生活》，只因找不到适当的主编，刊物还没有出世。徐伯昕与曹先生一谈就成功了。原来曹先生读过韬奋的著作，对韬奋是敬佩的，现在听说韬奋愿意来主编这个刊物，自然



喜出望外。他们还谈定，曹先生只挂个社长兼督印人的名义，其他一切，如刊物内容，编辑方针等等，他都不过问，统统由韬奋负责。刊物的名称就叫《大众生活》，算作一九三五年底韬奋主编的《大众生活》周刊的复刊。

等到一切谈妥，已是四月底了，要在五月初出版第一期已不可能。韬奋是个急性子，他认为筹办这个刊物已经耗费了两个月的时间，不能再拖了，必须尽快把复刊的《大众生活》送到读者面前。他邀请了六个人加上他自己组成一个编委会，其中有我，还有金仲华、夏衍、千家驹、胡绳和乔冠华。在第一次编委会上，他提出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，周刊以逢星期六出刊为最有利，所以《大众生活》最迟到五月十七日一定要复刊，那一天正是星期六。他又建议编委会每周开一次，检讨上一期的得失和确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，并在这个范围内每个编委自己认真写一篇文章或负责拉一篇稿。他这些建议全体编委通过了。这时有人提出刊物最好有一连载的长篇小说，内容能够吸引香港的读者，否则，全是硬性的政论文章，他们接受不了，就会影响到刊物的销路。大家都认为这个意见对，可是又想不出哪里有现成的长篇小说。

隔了一天，大概是“五四”的下一天，韬奋专程过海来看我。他说，那天会上当着你的面，大家不便说，会后都向我建议，《大众生活》上的连载小说，应该请你来写，你的名气大，下笔又快，承担这个任务是不成问题的。请你就作为紧急任务赶写一部吧。我为难道，长篇



在《大众生活》上连载的《腐蚀》。

小说哪能说写就写得出来的。韬奋说，这也是万不得已，你就把平时积累的素材拿出来编个故事吧。你可以一边写一边登，大约每期只占四个页码，八千字左右。三八年你在《立报·言林》上不就边写边登过一个连载小说吗？我说，所以那部小说写失败了。韬奋道，我不这样认为，那是第一部写抗战的长篇小说，在帮助当时的青年认清持久抗战的道路来说，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。我沉吟片刻，咬咬牙说：好吧，我来写！你什么时候要第一批稿？韬奋扳了扳手指道：给你一个星期，十三号交稿。我给你留出四个页码，你给我四天印刷的时间。

送走了韬奋，我就坐下来考虑写什么好？香港以及南洋一带的读者喜欢看武侠、惊险小说，这种小说我自然不会写。不过国民党特务抓人杀人的故事，以及特务机关的内幕，却也有一层神秘的色彩。我曾听人讲过，抗战初期有不少热血青年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战地服务团等假招牌招募了去，加以训练后强迫他们当特务，如果不干，就被投入监狱甚至杀害。还听说，陷进去的青年有的偷偷与进步人士联系，希望得到帮助，使他们跳出火坑。韬奋就接待过这样的青年。如果写这样一个故事：通过一个被骗而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沉沦的青年特务的遭遇，暴露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凶狠、奸险和残忍，他们对纯洁青年的残害，对民主运动和进步力量的血腥镇压，以及他们内部的尔虞我诈和荒淫无耻，也许还有点意思。故事的背景可以放到皖南事变前后，从而揭露蒋介石勾结日汪，一手制造这“千古奇冤”的真相。然而写长篇，总要预先有所准备：写个提要，列个人物表……一周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。于是决定采用日记体，因为日记体不需要严谨的结构，容易应付边写边发表的要求。我一向不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写法，这时也不得不采用了。小说主人公即日记的主人，决定选一女性，因为女子的感情一般较男子丰富，便于在日记中作细腻的心理描写。我给这部小说取名《腐蚀》，以概括日记主人的遭遇。为了吸引读者，我在书前加了一段小序，假称这本日记是我在重庆某防空洞中发现的。这段序言后来引起不少误会，一些天真的读者以为当真有赵惠明其人，来信询问日记主人后来的下落。



《腐蚀》的国内外各种版本。

我写《腐蚀》时，已从旅馆搬到了香港半山的坚尼地道寓所，那里环境十分幽静，有利于我每周交出八千字的文稿。我能够从旅馆里搬出来，全靠德沚的“神通”。在我到达香港两个多星期后，德沚也来到了香港。她是同徐伯昕的夫人结伴，搭上某人的小卧车，先到了湛江，再乘轮船来

香港的。她见我还住在旅馆里，就抱怨道，靠你这点稿费，没有资格长期住旅馆。第二天，她就出去找房子，傍晚回来，房子已经找到，就在坚尼地道。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洋房，附有花园。房东七十多岁，原是香港某大银行广州分行的经理，广州沦陷后，回到香港，“息影家园”。原配夫人早已去世，现在当家的是二太太——一位五十多岁的胖女人，另外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。他们住在楼下，楼上全部出租。已经有两户房客，厢房住的是沈兹九和她的女儿，正房住的是《世界知识》的编辑张铁生。德沚带我去看的是装了玻璃窗的阳台，广东人叫骑楼。但这骑楼与张铁生住的那间房隔一玻璃门，出入需经过张的房间，我觉得不方便。沈兹九便说，她不久要去新加坡，她住的厢房就可以让给我们。

下一天，我们就搬进了那间骑楼。房间狭窄，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。我们把一些不用的书稿和杂物装了两藤篮，寄存在房东的地下室里。房东是旅美华侨，性格开朗，也健谈，可惜他不会讲普通话，我又听不懂广东话，我们交谈，只得用英语。我告诉他，我是写文章的，他见我不像歹徒，也就放心了。我发现，香港的有钱人生活并不安逸，时时在提防歹徒的袭击。譬如《大众生活》的社长兼督印人曹先生，曾请我们到他家里吃过一顿饭，他家的房子也很漂亮，两层的洋房，四周是花园，但为了防备夜间歹徒的侵入，整栋楼用粗铁条网子似的罩起来，像鸟笼一般。我们的房东招揽房客，显然也不是为了几个房租，而是为了壮胆——楼内人多势众，增加了安全感。所以他对房客的选择很严格。

《腐蚀》动手之后，写得十分顺利，可以说是一气呵成。不过，因此停止了《如是我见我闻》的续写，也推迟了创办一个文艺刊物的准备工作。

小说一发表，很受欢迎，虽然这是一部政治气息极浓厚的作品，却吸引了香港、南洋众多喜爱惊险小说的读者，反应如此强烈，是我始料所未及的。我的原计划是写到女主人公的爱人小昭牺牲就结束全书，可是八月上旬，当小说连载到第十四期，即将结束时，在一次编委会上韬奋对我说，我已看完《腐蚀》的结尾，不少读者来信，希望你在小说中给赵惠明

一条自新之路；请你考虑，能否再续写几节，给主人公一个光明的前途？另外，《大众生活》每十期成一合订本，连载小说的起讫最好能与合订本一致，免得给购买合订本的读者带来不便，《腐蚀》最好能连载到二十期。那时，我已经在筹备文艺期刊《笔谈》的出版，原想结束《腐蚀》将大部精力投入《笔谈》的创刊，经韬奋这么一请求，只得把赵惠明的“日记”继续写下去。我在原来的结尾后面，加了一段女主人公被派到某大学区的邮局内当邮检员的故事。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刚刚陷入特务罗网的女学生，并帮助她从火坑中逃了出去。至于她自己的前途，我在书中写了革命者对她的期望：“生活不像我们意想那样好，也不那么坏。只有自己去创造环境。……她一定能够创造新的生活。有无数友谊的手向她招引。”

《腐蚀》在《大众生活》上连载之后，上海的华夏书店在十月份赶印了单行本。然而，由于当时环境所限，《腐蚀》引起的轰动，仅限于香港、南洋和孤岛上海等几个城市，而且是短暂的，因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也就在战火中湮没了。《腐蚀》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，是在日本投降之后。那时，上海的知识出版社重新把《腐蚀》印了单行本，并且运到了重庆等地出售。不少报刊发表文章，称赞它是“当前政治有力的谏言”，“是一部用血写成的特务反动分子罪行的记录”，“是胜利后一本最受欢迎的书”等。这就既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，也受到了共产党的欢迎。国民党紧急下了密令，到各书店查禁。共产党则在各解放区翻印，向广大群众推荐，有的单位甚至把它规定为学习材料。在我所写的长篇小说中，《子夜》是国外版本最多的，而《腐蚀》则是国内版本最多的。想不到作为“紧急任务”赶写出来的这部小说，竟发生了如此广泛的政治影响！

解放以后，对《腐蚀》的看法有了分歧，占主导的意见是：不该给赵惠明这样一个满手血污的特务以自新之路，因此，“这是一本对特务抱同情的书”。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《腐蚀》时，我写了一个《后记》来表明我的看法，我写道：“在考虑了这几年来我所听到的关于《腐蚀》的几种意见以后”，我决定“终于不作任何修改”。

一九四一年是风云突变的一年。希特勒席卷了大半个欧洲，六月二十二日又贸然以三百万大军向苏联进攻，十月攻抵莫斯科近郊。日本军国主义向东南亚挺进，占领了安南，侵入爪哇，对重庆政府则加紧了政治诱降。在国内，蒋介石炮制皖南事变，强化法西斯统治，扼杀人民的基本权利，消极抗战，积极反共，内战危机空前严重。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，我认为在香港的作家们不能仅仅埋首于创作，只关心文艺问题的论争，而应该拿起杂文这把匕首，像鲁迅那样，为读者痛快淋漓地剖析当前的形势，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，戳穿其外强中干，针砭社会的黑暗与丑恶，指出民生疾苦之由来。我自己是努力这样去做的，我把撰写杂文列为我分内的任务和经常的工作，甚至把它放在创作的前面。在香港的九个月中，除了《腐蚀》，我只写了一个短篇小说，却写了近百篇杂文。

那时，廖承志是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责人，他十分重视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与研究。在我们这批文化人来到香港不久，他就提议每周举行一次时局漫谈会，相互交流情报，交换意见。参加这个漫谈会的人，记得有邹韬奋、金仲华、杨东莼、乔冠华，好像还有范长江、夏衍、胡绳等。每次开会，都是先由廖承志介绍国内形势，再由乔冠华讲一讲国际形势，然后大家漫谈。廖承志的国内形势报告是漫谈会的中心，他经常在报告中传达党的重要文件和指示，介绍延安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。乔冠华的国际形势分析也很吸引人，他刚从国外回来，掌握了丰富的材料。这个漫谈会实际上是廖承志组织的一个小型学习会，在会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，也给我提供了不少写杂文的材料。在香港期间，我与廖承志的直接联系，主要就是通过每周一次的漫谈会；至于日常工作，仍由叶以群担任联络员。以群和宋之的、章泯他们是四月下旬到达香港的。五月四日，文协香港分会召开了第三届会员大会，对我们这批内地来的作家和艺术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。也在那个会上，我和夏衍被选为香港分会的理事。

下面讲一讲我在香港写的杂文。我的杂文从内容分大致有这样几类：一类是讥弹政局、针砭时弊的，这类文章最多，如《复活》《释谣》《谈



所谓“暴露”》《由“侦谎机”而建一议》《事实是最无情的》《“古”与“今”》等。一类是要求民主自由、反对法西斯专政的，如《读“人权运动专号”》《“善忘”与“不忘”》《人权运动就是加强抗战的力量》《无话以后》等。又一类是批驳复古谬论的，如《偶然看到》《“人心不古”》《论今日国内的复古倾向》等。再一类是嘲讽那些御用文人的，如《“士”与“儒”的混协》《谈“提高”“增加”之类》等。还有一类是议论国际时事的，如《成见与无知》《V字运动的“双包案”》《希特勒怎及拿破仑》等。这些杂文，大部分登在《华商报》的副刊《灯塔》上（我实践了对夏衍的诺言），直到八月份我要主编《笔谈》，才减少了给《灯塔》的投稿。此外，在《大众生活》和《笔谈》上也写了不少。这些杂文长不过千字，短的三五百字，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，仅抄录两篇以显一斑。



《笔谈》的封面和《开荒》。

一篇叫《谈提倡学术之类》，载于六月九日《灯塔》。文章说：“不久以前，看见一篇某地的通讯，历举各物涨价，独文章并未涨价。近来又见

报载，有什么十万元的学术奖金，将以嘉惠寒士，共成‘右文’之盛云云。”“抗战以来，论字数卖文的知识分子，有时被人恭维，说他们是文化战线上的战士，有时又被清客豪奴们恶骂，诬之为‘第五纵队’；被恭维的时候是猜想他们或可被收蓄而豢养，被恶骂则因他们的穷骨头还是太硬。”“其实照此米珠薪桂不复是夸张的形容词的时候，谁要是遵照了奖金条例去著作，结果恐怕也还是要饿得半死。卖文的知识分子，生活向来简单，不像某要人仓皇离沪时对人‘诉苦’说：‘我只有三百万，只够吃粥。’卖文者今日之所苦，除了百物涨价而文章不涨价以外，更还有一层，即文章难写。文章题材，无非是‘现实’生活。但要写‘现实’，则大后方就不准，甚至在海外也会飞来一顶帽子，几被开除国籍。‘现实’既犯忌讳，那只好谈历史。然后奸臣贼子，何代无之，所以一谈历史又有毛病，据批令是托之古事，以讥当世，相应不准。我就看见有几篇实非讽世的历史题材的东西，被封进了黑箱。结果，剩下来还有一个题材，就是‘梦’。……但据说张恨水先生亦‘早已不干卖文生活’，那么，‘梦’也许又犯了忌了。在有些人看来，做梦是不甚安分的勾当也！”“原料断绝，卖文者只剩饿死一条路了。……因此归根一句话：与其什么奖金，还不如开放文网罢！但如果奖金另有其作用，则此一提议，理合声明取消。”

另一篇叫《青年的痛苦》，载于六月三十日《灯塔》。文章如下：“现在最痛苦，莫过于大后方的青年了！失业失学者，且置不论，即幸有一业一读书之地者，食不得饱，书亦读不到什么，犹为小事，而动辄遭遇非法暴力之摧残，生命发生问题。原因很简单：同学同事中之任‘特务’者，要表现‘工作成绩’，便不得不以别人的灾祸作为他们自己的幸福；如果你知趣识相，逆来顺受，则金钱万能，尚可为消灾弭祸的媒介，然而你家无铜山，一旦应付不出，则就糟了。又或赋性戆直，热血未冷，看见太荒淫无耻卑鄙恶劣的行为，要议论这么一两句，那更其是罪有应得，名列‘黑册’，身入‘防空洞’，直早晚间事。‘特务工作’深入学校，本早在抗战以前，但在抗战以来，则变本加厉。推原其目的，当为防范所谓‘异党分子’，加强国民党在青年中的领导。但其结果，意志坚强，思想纯洁



的青年，被作为‘异党’而排除了，意志薄弱，品性恶劣之辈则或积‘功’而成为贪污之后备军，或因堕落腐化，狡谲善噬，而成为模范之‘忠实分子’。于是在青年眼中，所谓领导青年不过如此，在国人眼中，所谓防范异己，又竟是那么一回事！然而‘爱护青年’之声，还是洋洋盈耳，‘青年为国家根本’之论调亦复时见报章，言论与事实之刺谬一至于此，直不知是人间何世了！至于‘思想自由’之列为禁章，‘青年权利’之视为邪说，简直不能不算作‘进步’而‘文明’的措施。有些家长以为自家子弟忠厚温良，出不了岔子，殊不知忠厚温良，即为祸阶；倒是狡诈恶劣，斯为福本！然而青年群中，毕竟是忠厚温良者居最大多数，于是乎青年苦了！”

除了杂文，我也写过一些政论文，如《更须努力进步》《双十感言》等。我在写杂文和政论文时，很注意运用曲笔，以便躲过审查官的剪刀。在这方面我是比较成功的，我的文章被开了大天窗的不多，只有三四篇，不像韬奋的文章，有的被删得只剩个标题。这些开了天窗的文章，现在只能永远带着它们的残疾了。不过也有例外，《更须努力进步》这篇文章，就由于当时一稿二投（《华商报》和《上海周报》）而得以保存了原貌。登在《华商报》上的被审查官删去了这样两句：“也有些顽固分子，吃摩擦饭的专家，配合着敌人的政治进攻。眼光只看到个人的利禄，派系的特权”，因为这里骂了国民党；而登在《上海周报》上的，这一段文字被全部保留了，可是又把文章中的“敌”字改成了“日”字，把“敌人的一切阴谋狡计”改成了“日人的一切计谋”，因为骂日本，在上海租界上是犯忌的。

到香港开辟“第二战线”，我所担负的任务是办一个文艺刊物。此事，原以为举手之劳，谁知竟几经周折，到七月底，才有了点眉目。问题仍旧出在要向香港政府办登记上。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，如我们先要把《大众生活》办好，我个人还有赶写《腐蚀》的任务。解决登记的问题，最后还是请出了曹克安先生，我们同样请他担任挂名的社长兼督印人。